

林語堂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

張東寶*

諸孝正在《林語堂評傳》序言中指出：“林語堂說自己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照我看，他的成就雖然兩方面都有，但以‘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更為重要。他介紹中國文化的英文著作有二三十種之多。在國外出版這類著作種數之多、印量之大、影響之深遠，恐怕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和他相比”。¹ 筆者以為，這個評價是準確的。

一

林語堂(1895-1976)，又名玉堂，筆名毛驢、幸我、薩天師等，福建龍溪人。他是現代著名的學者、文學家和語言學家。林語堂出身於一個基督教家庭，他的父親林至誠是一位牧師，為人“敏銳而熱心，富於想像，幽默詼諧”。² 他通過自學，有一定的國學基礎。林至誠對自己的孩子們，和藹可親，除送他們上學念書外，平時還親自教他們讀書。林語堂六歲入阪仔的銘新小學。十歲時，跟他的三哥到廈門鼓浪嶼教會小學讀書。每逢暑假，他們兄弟回到家裏，林至誠教他們讀四書、《詩經》、《聲律啟蒙》和《幼學瓊林》等書籍，還教他們對對聯。林語堂曾說：“我所有的些少經書知識乃早年由父親庭訓而得”，“我因為幼承父親的庭訓，對儒家經典根底很好，而我會把它銘記於心”，“少時常聽我父親引孟子說：‘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這句話不知如何，永遠縈繞在我心上。這樣的人生觀，不是很好的嗎？”他甚至還表示過，“行為尊孔孟，思想服老莊，這是我個人自勵的準繩。‘文章可幽默，作事須認真’，也是我律己的格言。這種態度，與我少時的家教有關”。這就表明，少年時期的家庭教育，使林語堂受到了我國

傳統文化的薰陶，並對他後來的人生觀和治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外，林語堂也從他父親那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啟蒙教育。譬如，經常引導他學好英語，到國內外最好的大學去讀書；給他灌輸基督教義；使他從小就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還鼓勵他看林琴南譯的西洋小說，如《福爾摩斯》、《天方夜譚》、《茶花女》，以及史各德、狄更斯、莫泊桑等人的作品。

林語堂十三歲時，進入廈門教會學校尋源書院讀書。之所以進這所學校，是因為他父親是信仰基督教的牧師，而且該校可以免交學費和膳費。在這裏讀書，林語堂感到“白費光陰”。該校校長是美國人畢牧師，無意於教育而醉心於發財，品行貪婪。他當時熱衷於做房地產生意，林語堂經常聽見他在辦公室裏不停地打算盤。尤為不合理的是，該校規定學生不准看中國的報紙，不准看中國的戲劇，不准學習中文。這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其結果，嚴重影響了林語堂學習祖國的文化知識。林語堂後來發現自己在瞭解祖國的文化知識上有很大缺陷時，便對該校的教育有“憤恨”之情。在失望之余，林語堂只好自行閱讀一些傳統文化書籍。他曾閱讀過蘇東坡的作品，並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也接觸過司馬遷的《史記》，袁了凡的《綱鑒易知錄》等。

林語堂十七歲時，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於尋源書院，並幸運地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該校是當時中國培養英語人才的基地。他先在該校的預備學校學了一年半英語。由於刻苦用功，經常鑽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對於任何一個英文字，或是一個英文片語的用法，如不弄清楚，決不放過，因而把英語學通了。課餘，林語堂喜歡到學校圖書館挑選書籍看。他先後借閱了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赫克爾的《宇宙之謎》、華爾德的《社會學》、斯賓塞的《倫理學》、韋習特墨的《婚姻論》，等等。通過閱讀這些著作，使

* 福建省老子研究會顧問

他增加了社會科學知識，增進了對西方文化和生活的瞭解。在聖約翰大學，林語堂幾乎完全停止了對中文的研讀。該校雖然開設了中文課，但校方根本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即使學生的中文成績年年不及格，也照樣可以畢業。林語堂很喜歡參加體育活動，由於愛好運動，使他具有強健的體魄。這對他後來參加某些重大的社會活動，和長期從事筆耕生活，是極為有益的。對於在聖約翰大學的學習生活，林語堂後來作了這樣的評價：“自我反觀，我相信我的頭腦是西洋的產品，而我的心卻是中國的”。

1916年，林語堂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後，應北京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校長周詒春之聘，任該校英語教員。林語堂到清華學校之初，還沒有完全擺脫基督教的羈絆，他的宗教意識畢竟根深蒂固。他認為，如果上帝不存在，整個宇宙將徹底崩潰，人類的生命自然也就不會存在。因而，他在校內自動兼帶一個星期日聖經班，並任聖經班的恭祝聖誕會主席。這自然大受同事們的非議。正當他十分苦惱之時，他問同事劉大鈞：“如果我們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愛同行，將見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呀？”得到的答覆卻是：“為甚麼呢？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為我們是人的緣故。做好人正是人所當做的咧。”這一答話，體現了儒家人類尊嚴和西方的人文主義精神，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終於把他與基督教的精神聯繫沖塌了。他從此認識到，如果我們之所以愛人是要依賴與在天上的一位第三者發生關係，那麼，我們的愛並不是真愛，而真愛人的應該是看見人的面孔才會真心愛他。於是他感慨自己為甚麼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真是“愚不可及”。林語堂這時還有一個頗為苦惱的事情，就是缺乏扎實的國學知識。他一直在不重視中文學習的教會學校念書，儘管自學過一些國學書籍，但畢竟有限，更缺少系統，因而不僅“學問差”，連中文基礎也是“很浮泛不深”，“僅僅是半通”。而現在置身於中國文化中心的北京，且在中國最高學府的清華學校執教，他便深深感到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於是，他下決心“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博覽國學書籍，以充實自己，“洗雪恥辱”。他最先是從看《紅樓夢》着手的。他認為，這不僅可以幫助他學習標準的北京話，而且可以提高文學語言的修養。同時，他經常跑去以賣舊書著名的琉璃廠翻看和選購國學書籍。諸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四庫集錄》、《廣韻》、《韻府群玉》、《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等等。久而久之，他的國學修養不再那麼空疏了，不僅可以跟書商談論書籍，而且可以談論古本了。可見，在清華學

校任教期間，他重新打好了自己的國學基礎。他後來回憶說：“蓋自任清華教席之後，我即努力於中國文學，今日之能用中文寫文章者，皆得力於此時之功也。”

1917年1月2日，胡適和陳獨秀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等文，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主張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林語堂對於這場文學革命運動，熱情關注，並表支持態度。

林語堂於1923年12月1日《晨報五週年紀念增刊》上，發表了《科學與經書》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胡適並沒有完全解決整理國故的諸多問題。因而，他提出：“我們可以毅然無疑說‘科學的國學’是我們此去治學的目標，是我們此去努力的趨向。因為科學的知識與方法都能幫助我們把舊有的學問整理起來做有系統的研究”。他這裏所說的“科學的知識與方法”，是指“用西洋學術的眼光、見識、方法、手段，及應憑的西洋書籍來重新整理我們的國學材料”。那麼，怎樣使國學研究具有科學性呢？他以為一要有科學的考證，二要有科學的研究，使“一字一句常因科學的知識(即比較參考的材料)而愈明白”，“拿定國學新的目的，搜集新的材料，擬定新的問題，立定新的標準，整理新的系統”。此外，他強調國學研究不能拘泥或停留於註釋或校勘工作，而應分門別類地進行系統研究，才會使“國學得了一大新運命新魄力，猶如久旱將乾的溪壑忽得秋霖大雨，沛然而下莫之能禦，此內容的革新與元氣的勃發不能不謝科學直接激動之力”。1924年11月7日，《語絲》週刊創刊。這一刊物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魯迅的學生孫伏園。他創辦這一刊物之初，邀請了十五位支持者作為固定撰稿人。但始終堅定不移的撰稿者，即只有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五六個人。這期間林語堂、魯迅往來較為密切，他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比較一致。圍繞着“女師大風潮”，“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之間及反對章士釗的鬥爭等等，林語堂與魯迅並肩攜手，相互支援，共同形成了“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的“語絲文體”(《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在鬥爭中，林語堂的激烈程度不下於魯迅，他在文章中反對“倚門賣笑，雙方討好”的“學者”風度，讚揚“揭竿而起”，“少作揖讓”的“土匪”精神，抨擊腐敗政府把“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官國”。林語堂還對“費厄潑賴”(所謂“費厄潑賴”，乃英語Fair Play的音譯，原為體育比賽所用的術語，

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賽，不用不正當的手段。西方會有人提倡將這種精神用於社會生活和黨派鬥爭中，認為這是每一個開明紳士應有的涵養和品德，由贊同到受魯迅影響而擯棄。同樣是受魯迅影響，他還曾是“打落水狗運動”的急先鋒。後來，他被迫逃亡，出任廈門大學文科主任兼國學院總秘書，繼續從事語言學研究，他反對扼殺國學研究，投身加入武漢的國民政府，在中央研究院任職，在東吳大學任教和編寫英語教材，創辦《論語》雜誌，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宣傳主任”，他譏評時政，提倡幽默，提倡性靈(即個性)，提倡語錄體(即在認真提煉白話的基礎上吸收文言的簡煉，而寫成的雜文、隨筆)。他創辦《人間世》和《宇宙風》雜誌，暢談小品文的特性，反對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他重視古代文化遺產。魯迅曾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林語堂是中國現代優秀的雜文家之一。在這裏有必要提一下，魯迅和林語堂，曾經是朋友，後來有了爭論，因而在某一時期疏離，甚至絕交，但後來又重修舊好。林語堂說：“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魯迅研究資料》第十三集)。1934年8月13日，魯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說：“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在魯迅與林語堂的交往過程中，最主要的矛盾，一是二十年代的“費厄潑賴”問題，二是在對中國“國民性”的探究上，三是三十年代的提倡幽默、閑適、抒寫性靈的小品文的問題。此外，還有一些彼此的謾罵與糾紛。比如，魯迅曾罵林語堂為“西崽”，這是為人們所熟悉的。故而，1988年1月15日上海的《聯合時報》上曾發表全國政協委員、新聞界知名人士徐鑄成對記者的談話，他說：“難道三十多年前魯迅的一句‘西崽’就能把林語堂的一生概括嗎？何況林語堂並不是甚麼‘西崽’，按其生平，也可以說是沒有一點媚骨的文學大師”。當然，林語堂也曾在1929年8月的日記中，罵魯迅“已成神經病”。由此可見，二人由知己至仇怨，已到劍光鋒芒的程度。縱觀林語堂的前半生，可謂豐富多彩，不乏可圈可點及自我矛盾之處，正如他自己在《八十自敘》中所說：“我只是一團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為樂”。³有人說，其實世界上沒有絕對單純的人，人人都是一團矛盾，不過有人的矛盾比較簡單、清晰，有人的矛盾則既多且亂，不容易理出頭緒來。林語堂身處政治、學術紛爭的時代，且又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各種矛盾在他身上反映出來是不奇怪的。但筆者更欣賞的是林語堂的後半生，這是他人生道路上

最值得稱頌的華彩樂章。

二

一般人大都把林語堂看作一個作家，其實他更是一個有建樹的國學家。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經歷了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環境，以西方文化作為參照系，對我國傳統文化既有宏觀上的把握，又有微觀方面的研究，創獲不少。而五四以來，在怎樣對待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問題上，一直未能得正確的解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和激進的文化人反對封建文化，批判復古派，無疑是正確的。可是，由此卻導致了全盤否定古代文化遺產的傾向，並認為古書有毒，教導青少年應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林語堂早年也曾持此種看法。後來，林語堂對古代文化遺產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在《煙屑》一文中表示最愛看佛老孔孟莊等“極上流書”⁴，並在《古書有毒辯》一文中對古書問題談了頗為精當的看法。⁵他不否認古書中有不好的東西，如“義俠小說之毒一，在提倡忠孝節義”，“言情小說之毒二，在讀者學寶玉的好吃女人胭脂”，“詩文小品之毒三，在吟風弄月”。但他並不認為凡古書都有毒，更不是只有毒，否則，“胡適之早已中毒，梁任公早已瘋癲，周樹人、周作人早已七孔流血，鄭振鐸、傅東華雖未能撰着中國小說史略，抄抄唐宋傳奇，毒雖未深，亦當呻吟床褥矣！”他還進一步指出：“古書誠不能無病，現代人也不能單看古書，這何消說，但一見古書，便視為毒品，未免有點曬不得太陽吹不得野風的嫌疑罷。現代人貴能古今，難道專看甚麼斯基譯作，讀洋書，說洋話，打洋嚏，撒洋污，史記漢書不曾寓目，詩經左傳一概不識，不也是中洋毒嗎？中國用得着這種讀書人麼？這樣讀書，不是洋書也有毒麼？所以毒不毒，在人善利用他是非鑒別的聰明，不是把古書束之高閣，便可自謂清白身體”。1934年7-8月間，在江西廬山避暑的林語堂，歷時約十個月的書稿——《吾國與吾民》完成了。此書脫稿後，林氏立即送給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1892-1973)過目。賽氏讀完書稿後，驚喜異常，認為這是一部“偉大著作”，並欣然寫了序言：“與歷來的偉大著作的出世一樣，《吾國與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筆墨是那樣的豪放瑰麗、巍巍乎、煥煥乎，幽默而優美，嚴肅而愉悅。……這一本書是歷來有關中國的著作中最忠實、最巨大、最完備、最重要的成績。尤可寶貴者，它的著者，是

一位中國人，一個現代作家，他的根蒂鞏固地深植於往者，而豐富的鮮花開於今天”。在賽氏的支持下，《吾國與吾民》於1935年9月由美國華爾希(賽珍珠的後夫)雷諾公司出版。書出版後，很快在美國受到好評。《紐約時報》星期日書評副刊第一版上，發表了克尼迪的評論文章：“只有一個中國人才能這樣坦誠、信實而又毫不偏頗地論述他的同胞”。《星期六文學評論週刊》也發表了著名書評家伯發的書評：“林先生在歐洲美國都住過，能以慧眼評論西方的習俗。他對西方文明有豐富的認識，不僅認識而且瞭解西方文明。他的筆鋒溫和幽默。他這本書是以英文寫作以中國為題材的最佳之作，對中國有真實、靈敏的理解。凡是對中國有興趣的人，我向他們推薦這本書”。在一片好評聲中，《吾國與吾民》於1935年四個月中印了七版，成為當年美國最暢銷的書籍之一。於是林語堂在美國一舉成名，備受推崇。對於林語堂以《吾國與吾民》在美國博得很高的聲譽，國內文壇卻有不同的反響。有的人認為中國人能在國際文壇成名，這畢竟是第一次，這是中國人的光榮。因而，林語堂一時之間頗受人們的器重，許多團體請他寫文章、演講，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對於一些非議，林語堂置若罔聞，保持我行我素的態度。三十年後，他才在《論足赤之美》一文中表明自己寫作《吾國與吾民》的心態。⁶他通過記敘美國商務參贊亞諾德出於尊敬之心，想拍下一位賣燒雞的白鬍老人的照片而被人誤認為污辱中國人的經歷，懇切地表示說：“知道這一點道理，才知道我《吾國與吾民》的寫法及立場。中國自有頂天立地的文化在，不必樣樣效顰西洋。看到深處，才明白中國人生哲學之偉大，固不在西裝革履間也”。

《吾國與吾民》一書，是最早向西方宣傳中國和中國文化的重要作品，該書有以下五個方面值得加以肯定。

其一，具有憂國憂民乃至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林語堂在《自序》中說：“愛我的國家”，“坦白地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中國乃偉大過於她的微妙的國家，無需乎他們的粉飾。她將調整她自己，一如過去歷史上所昭示吾人者。”這是他對祖國所懷有的基本態度和看法，也是他寫作《吾國與吾民》所持的立場和方法。同時，他表示《吾國與吾民》是寫給“淳樸而忠恕的一般人”和“那些尚未喪失人類基本德性的人們”看的。也就是說，他是希望通過《吾國與吾民》一書來促進西方人民對中國的瞭解。正因為林語堂具有這樣的思想感情，因而儘管《吾國與吾民》描寫了中國人

存在着種種落後、保守和愚昧的精神狀態，即詳盡地剖析了消極的“國民性”，但並不使人感到他是在有意醜化中國人，而是足以引起人們的深思，認識它的實質和弊害，設法克服它，擯棄它。他指出：“……他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為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為美德，對於個人則為缺點。”其中所隱含的態度，應該說是嚴肅的。林語堂雖然指出中國人存在着不少的精神弱點，但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他說：“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雖然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於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中國人之心靈不可謂為缺乏創造力”，“久已熟習於文學之探討”，“而詩的培養尤足訓練他們養成優越的文學表現技巧和審美能力。中國的繪畫已達到西洋所未逮的藝術程度，書法則沿着獨自的路徑而徐進，達到吾所信為韻律美上變化精工之最高程度”。這樣一些看法，可謂充滿着熱愛中華民族的感情，熱情地讚頌了中國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尤其在文化藝術上有傑出的創造才能。

其二，對傳統的社會政治生活作了評說。林語堂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批評封建家庭制度有許多的弊害。諸如剝奪了個人自主的權利，使人喪失了訂婚權和夫妻的自由生活，失去了“事業心和發明天才”。但對孔子的“名分學說”和道德倫理卻作了一定的肯定。認為孔子是希望“倘使每個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動適合自己的地位，則社會秩序更能有把握的維持”。“他也曾允許某種程度的超家庭的仁愛。他把家庭內的道德訓練作為普通道德訓練的基礎，他計劃想以普通的訓練，實現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要很適宜於和諧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可是，他又認為孔子將政治與道德“混合”了，過於看重了道德的作用，其結果必然“對於國家則為危害”。在他看來，要建立和維持一個正常合理的社會，僅是講道德是遠遠不夠的。基於這樣的認識，林語堂對孔子理想的“賢能政府”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至於盼望德行統治的政府與仁義的統治階級之出現，那是多麼屬於幻想”，其實際情形卻是“常為舉世無雙的一大腐敗罪惡”。為甚麼呢？那是因為統治者的“道德修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因而，他讚賞韓非子的“法治”主張，指出韓非子“始終擯棄道德之俗論”，“堅決主張設立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所

共同遵守，上不避權貴，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面前，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勢力與私人間的關係，應該予以打倒而代以法律”。由此，他又進一步表示，“深信吾人停止談論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則吾人之能建立中國之廉潔政府亦將愈早”，“中國所需要者，是以非增進道德而為增加牢獄以待政客”，“中國所需要者，既不為仁，亦不為義，又非為榮譽，卻為單純的賞罰，即需要勇氣來槍決掃蕩這班不仁不義不顧廉恥的官僚。惟一保持官吏廉潔的方法即為加以逮捕而用槍彈來警戒他們”。他的這些看法，是有眼光有見地的，並切合社會實際需要的。

其三，對傳統的文化思想作了評價。林語堂在《人生之理想》中，對儒、道、釋作了宏觀的評價。他認為，孔子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孔子學說是一種對待人生與宇宙的思想，以“人”為中心，以中庸之道為核心思想，要求人們為人處事合乎人情的“常軌”。孔子以禮義為教，以順俗為旨，重視人類的教育與禮法。孔子學說的人生觀是積極的，他的哲學的本質是都市哲學，過於崇尚現實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之成份。

其四，對傳統的文化藝術作了評價。林語堂在《文學生活》、《藝術家生活》等章節中，認為唐詩長於運用塑形的擬想，繪畫技巧，象徵主義和隱喻手法。古代戲劇(主要指元曲)有獨特的藝術形式，其中有不少堪稱為偉大的詩篇，是“貧苦階級的精神食糧”。《紅樓夢》“不愧為世界偉大作品之一。足以代表中國小說寫作藝術的水準高度”。可是古代小說大都存在結構散松，冗長，自足於講述故事，缺乏歐美小說的主觀特性等弱點。對於中國的繪畫和書法，林語堂更是倍加讚美。他說，中國繪畫是“中國文化之花。它完全具有獨立的精神氣韻，純然與西洋畫不同。……顯著有某種神韻的靈活的特性，更有一種筆觸上的豪邁與活潑的情態。……它並不將一切意象繪之於畫面，卻剩下一部分須待觀者的想像”。它既具有線條上的美質，像筆力，筆趣，蘊蓄，精密，遒勁，簡潔，厚重，波磔，謹嚴，灑脫；又具有結構上的美質，如長短錯綜，左右相讓，疏密相間，矯變飛動，等等。所有這樣一些論評，表明了作為國學大師的林語堂，對於我國的文化藝術是較為熟悉的，有些看法還是頗為新穎的。

其五，閃爍着針貶時弊的鋒芒。林語堂在書中，不時聯繫現實，針貶時弊，機鋒閃爍，並不乏幽默感。譬如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他有力地抨擊統治者徇私舞弊，敲榨錢財，胡作非為，並認為官僚是

“民主主義的天然敵人”，不丟掉他們的“面子”，“中國將不成其為真正的民主國家”。他更是點名指斥張宗昌等現代軍閥“簡直有一顆墨黑的心”。他還指出中國的政治之所以那麼腐敗，“完全在制度(法)”，“倘官僚貪污而無刑罰為之制裁，那麼你要望他不貪污，實在是過於苛求人類的天性了”等等。

《吾國與吾民》一書，除了具有上述值得肯定的方面之外，也存在着一些明顯的局限性。這首先表現在宣揚了所謂歷史循環論，把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說成是以八百年為一週期的，甚至還說甚麼“故吾人可未卜先知此後二百年之局勢；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國被異族所征服。真將一一重演乎？”同時，對現代中國人民的不斷覺醒缺乏認識，反而認為他們缺乏自信心，一盤散沙，畏懼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指少數中國人尚可，若是指大多數中國人便不符合實際，因為現代中國人民一直都在頑強地進行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不過，儘管《吾國與吾民》一書存在着類似這樣一些嚴重的缺陷，但瑕不掩瑜，它仍然不失為有自己特色和一定價值的著作。

1936年初，夏威夷大學邀請林語堂前去執教，賽珍珠夫婦也一再希望他到美國去寫作。經過再三考慮後，林語堂決定全家旅美。他作出這樣決定的原因是甚麼呢？這跟他提倡幽默、性靈時與左翼作家發生激烈論辯有一定關係，他想以赴美來擺脫一下尷尬的處境。而1935年《吾國與吾民》一書在紐約出版後受到美國讀者的熱情歡迎，使他認為去美國致力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一條可行之路。還有一個原因不可忽視，那就是林語堂與好友現代唯美派詩人、出版家及被譽為“文壇孟嘗君”的邵洵美，曾先後合作創辦了《論語》、《人間世》與《宇宙風》雜誌(在抗戰期間，邵氏還在極困難的情況下，主辦了抗日刊物《自由譚》和《公正評論》，並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譯成英文而首次公開發表在自己的刊物上)。在二人交往的過程中，林語堂獲悉了邵洵美祖父邵友濂的一條警世遺訓。原來，20世紀初，湖南巡撫邵友濂臨終時，給後代留下一條遺訓：“三四十年之內，必然要發生世界大戰，中國將是被各國軍隊分割混戰的戰場，全國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不能照搬以往的‘小亂避城，大亂避鄉’的辦法。要避難，只有到美國最安全”。此言可謂“不幸而言中”。三十多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橫掃歐洲大陸，先後吞併波蘭、荷蘭、丹麥、挪威諸國，攻佔法國本土，逼近英倫三島，轉而又入侵蘇聯。日本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又偷襲珍珠港，並南下佔領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及

印度尼西亞，戰火遍及五大洲四大洋。相對而言，美國本土地處大洋彼岸，由於地理環境的優勢，最為安全。為何邵友濂對於世界大勢預測得如此準確呢？考察一下邵友濂的行狀，原來他懂西方語言，早年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章京”一職，邵友濂馳騁外交舞台數十年，折沖樽俎，眼界開闊，因而深知天下大勢。他瞻望五大洲四大洋，斷言惟有美利堅合眾國才可成爲未來避大難的一方淨土。不言而喻，“邵氏預言”是其多年外交生涯洞察世界八方風雲變幻的結晶。在日寇欲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時，林語堂不禁想起了邵友濂的遺訓。故而，幾個原因促使他在 1936 年攜帶妻女，離開故土而移居美國。林氏此番行動似乎實踐了孔子的理論：“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林語堂這一走，不僅避免了抗戰中眾多文化人跋山涉水、顛沛流離之苦，而且也無從遭遇後來發生的“反右”、“文革”等悲慘事件，這是傳統文化帶給他的幸運。

1936 年 12 月 19 日，林語堂應美國幾個團體的邀請，參加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有關西安事變的公開討論會。他在會上發表了講演，認爲張學良軟禁蔣介石的目的，是爲了抗日救國，否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的說法，並預言這件事的結局將是喜劇而不是悲劇，張學良不久會釋放蔣介石，還會陪同他回到南京去。他的這些見解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興趣，會場上不時發出一陣陣掌聲。

林語堂旅美之目的，是爲了專心寫作，向西方宣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因而，他於 1937 年便寫了轟動美國的《生活的藝術》一書。林語堂在《關於〈吾國與吾民〉及〈生活的藝術〉之寫作》（《語堂文集》下，台灣開明書店 1978 年版）中說：“因爲中國之生活藝術久爲西方人所見稱，而向無專書，若不知內容，到底中國人如何藝術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觀山，如何玩水，如何看雲，如何鑒石，如何養花、蓄鳥、賞雪、聽雨、吟風、弄月。……夫雪可賞，雨可聽，風可吟，月可弄，山可觀，水可玩，雲可看，石可鑒，本來是最令西人聽來如醉如癡之題目。《吾國與吾民》出所言非此點，而大部分人注意到短短的飲食園藝的《人生的藝術》末章上去，而很多美國女人據說已奉此書爲生活的法則。實在因賞花弄月之外，有中國詩人曠懷達觀、高逸退隱、陶情遣興、滌煩消愁之人生哲學在焉。因有許多讀者欲觀此中底奧及一般吟風弄月與夫家庭享樂之方法，所以書局勸我先寫此書。不說老莊，而老莊之精神在焉，不談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這是我寫此書之發端”。⁷ 可見，

林語堂是爲了將中國的傳統生活藝術和人生哲學介紹給西方讀者而寫作此書的。林語堂之所以能寫成這部書，跟他向來關注人生問題和熱愛生活有關。正如他說的，他喜歡“直接拿人生當作課本”，並經常愛讀中國古代文化中有關人生哲學和生活藝術的著述。而且，他把大量的這類書籍帶來了美國。除《論語》、《老子》、《莊子》這些儒道經典著作之外，還有陳眉公的《寶顏堂秘笈》，王均卿的《說庫》，開明版《廿五史》，以及《文致》、《蘇長公小品》、《蘇長公外紀》、《和陶合箋》、《群芳清玩》、《小窗幽記》、《幽夢影》等等，因而，他寫起來便能得心應手，揮灑自如。

《生活的藝術》出版後，《紐約時報》書評副刊發表了吳滋的評論文章，稱讚林語堂“把許多歷史悠久的哲學思想濾清，配以現代的香料，他根據個人的獨特的創見，用機智、明快、流利動人的文筆寫出一部有骨子、有思想的著作。作者在書中討論到許多問題，見解卓越，學識淵博，對中西方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書評家 Peter Prescott 讀了這部書後，也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讀完這部書之後，令我跑到唐人街，遇見一個中國人便向他深鞠躬”。享譽世界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就是年輕時偶然翻閱了《生活的藝術》，深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從此投身漢語學習和漢學研究，滿懷“另一種鄉愁”，不辭辛勞地在西方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於是《生活的藝術》這部書便成爲美國 1938 年最暢銷的書。這表明，它在美國引起了轟動，爲祖國贏得了榮譽。此後，這部書接連不斷的再版，在美國先後重印到四十版以上。並被譯成十幾種文字，德、意、丹麥、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的版本，都一樣受到讀者歡迎。可見它產生了世界性的廣泛影響。這便奠定了林語堂在國際文壇的地位。甚麼叫“軟實力”？這就是貨真價實的“軟實力”！

林語堂認爲，文化生活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教育和文化活動的目標，應該是發展知識上的鑒別力和良好的行爲。因而必須注重培養對事物的明敏的能力，獨立的判斷力和膽力，不可捨此而片面地追求所謂的“博學”。他讚賞孔子提倡的思考精神，即所謂“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批評現代教育“偏於割捨了鑒別力以求學問。視強記事實即爲教育的本身目標”。“機械式的大小考試，爲害之大，遠過於我們所能想見”。這可謂切中了現代教育的弊端。他也欣賞莊子說的“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話，並以爲尋求知識“終不過是像去發現一個新大陸，‘一個心靈的探險行爲’。我們如用一種坦白的、

好奇的、富於冒險性的心胸去維持這種探索精神，則這種尋求行爲便永遠是一種快樂，而不是痛苦了，我們應該捨棄那種規定的、劃一的、被動的強記事實的方法，而將這種積極的滋長的個人快樂爲理想目標”。這樣強調探索精神能使人感到快樂，是很有見地的。

對於藝術創作，他則認爲是作家個性的表現，是藝術家靈魂的自然表現。在藝術作品中，最富有意義的即是技巧之外的個性。如缺少這個性，便成了死的東西。這不論怎樣高明的技巧都無法彌補的。因而，他反對商業式的藝術和政治式的藝術，認爲它們都會妨礙或扼殺藝術個性的表現。

以上所說的，便是林語堂提倡的“閑適哲學”的主要方面。從中可以看出，他確實是從人生的實際需要出發，盡力挖掘並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和道家等哲學的有關內涵，而且融入了他個人的見解。

1937年7月7日，林語堂得悉蘆溝橋事變的消息後，心情激憤，立即用自己的筆來宣傳抗日救國鬥爭。8月29日，他在紐約《時代週刊》發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一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自1931年以來怎樣得寸進尺地侵略中國，表示堅信中國是不可征服的，“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可謂表達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抗戰必勝的信念。這年《吾國與吾民》一書印第十三版，林語堂補寫了《中日戰爭之我見》一章。在這新寫的一章中，他一反該書漫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改爲縱談中國人民一致抗日的問題。他認爲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可救國家的，並非我們的舊文化，而是機關槍和手榴彈”，“只有當我們將日軍從我們土地上趕出去，或者強迫它撤退，我們才會再費時間，思索所有這種文化的大混亂是甚麼道理，並考慮又將如何來保存我們舊有的文化”。這表明他已把武裝抵抗並打敗侵略者，看作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正因爲這樣，他爲國、共兩黨自西安事變後建立了聯合戰線而由衷感到高興，並認爲“聯合戰線是中國情勢合理的發展”。在這當中，他肯定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歷史功績，即“強迫蔣氏同意聯合戰線，答應停止無益的剿共”，“爲聯合戰線鋪了一條道路”。同時，他稱讚了毛澤東、朱德以民族利益爲重，不計較個人恩怨的胸懷。他說：“共產黨領袖朱德和毛澤東，他們誠摯愛國，胸襟闊大，度量豁達，蔣氏曾向朱毛血戰八年，並高懸厚賞購彼頭顱，及西安事起，蔣命實操朱毛手中，但朱毛豪俠大度，送其出險，深信中國未來抗日戰爭，萬不可無此人”。此外，他讚頌了中國人民同仇敵愾，決心抗

戰到底的精神。他說：“中國抗戰的意志系來自民間，是由民眾着力迫使政府前進，擱置延長時間的政策”，“全國人民終於覺悟過來，若再妥協，當危害無窮。他們既看出日人野心永無止境，也看出日人一心想征服中國，決難中途翻改，更明白再讓予中國一寸土地，決非一個自尊自愛的民族所能容忍。全國人民已到了決心抵抗日本的一點，即使甘冒大戰之危險，亦義無返顧”。最後，他預言日本帝國主義必定失敗，而中國“將從戰爭中得救，將從戰爭中再生”。這些說法表明，在中華民族危機極爲嚴重的年代裏，他是一個堅決擁護全民一致抗日的愛國者。

次年，林語堂又發表了《美國與中日戰爭》和《日本必敗論》等文。前文揭露美國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表面上持“中立”的立場，而實際上卻暗地裏給予日本經濟上的支持，成爲日本的“經濟同盟”。他指出美國政府僅在1937年9、10月間，就賣給日本汽油337百萬加侖，還有大量的生鐵。這充分說明他具有強烈的愛國義憤。後文則從軍事、政治、經濟和外交等方面，論述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一定要失敗。他認爲日本的軍力不足以征服中國，日軍深入長江以後，其防線達一萬華里，處處爲遊擊隊所襲擊，只好反攻爲守，軍力財力消耗甚大，無法與中國打持久戰。在政治上，日軍野蠻殘暴之至，促使中國人民更加團結一致地抗日，尤其是極有組織和經驗的八路軍和民眾將使他們無法勾結土豪劣紳，沒有立足之地。在經濟上，日本軍用和商用材料都依靠外國進口，經費嚴重不足，經濟面臨破產境地。在外交上，日本將愈來愈孤立，蘇聯和英法美不可能坐視日本佔領中國，必定加以干涉。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而它出自一介文人之口，確實令人敬佩。林語堂的這些抗日救國言論，在美國公眾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起到了促使他們同情我國人民抗戰事業的作用。據說，當時日本輿論界覺得他們沒有一個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可以在世界上爭取同情爲憾事。這就說明林氏在向世界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鬥爭方面，確實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1938年1月，應藍登書屋的約請，林語堂編寫了《孔子的智慧》一書。據說，該書屋曾出版世界哲學叢書廿冊，其中一冊爲《孔子哲學》，頗爲暢銷，壓倒了康德、達爾文、斯賓塞等西洋哲學家。於是，該書屋擬出版《現代叢書》時，便認爲不可以沒有孔子的書，並邀請林語堂編寫。林語堂爲有這機會向西方介紹中國最重要的傳統文化思想而感到十分高興。《孔子的智慧》一書，較爲完整地表達了林語堂的孔子觀，

也較為系統地向西方介紹了儒家學說。在編寫此書之前，他雖然在不少文章中涉及到孔子及其思想，但都是零星的褒貶，缺乏總體性的評價。而在這本書中，他卻對孔子思想價值取向和特點，以及孔子的品格等等，作了較為切實的論評。在《導言》第一部分中，林語堂直截了當地提出儒家思想在現代生活中還有沒有價值的問題。他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他敏感地看到了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敵手”，那就是“整套的西方思想與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會思潮”。可是，他也毫不猶豫地表示，那些西方思想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反儒學派一樣，不可能將儒家思想根本推翻。其原因在於，“儒家思想的中心性與其人道精神之基本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他還說：“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復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在現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之前，被人目為陳舊無用，自是；若視之為人道主義文化，若視之為社會生活上基本觀點，我認為儒家思想仍不失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在這裏，他否定儒家思想作為政治制度或政治形態方面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但肯定它作為人道主義文化或社會生活上的基本觀念仍然適應現代人生需要，並具有“真理”一般的生命力。因而，他斷言“儒家思想，在中國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影響我們民族的立身處世之道”。這樣的見解，顯然不同於那種對儒家思想作全盤否定的看法，也多少有別於對它作全盤肯定的觀點，而是體現了一定的分析眼光和批判繼承的膽識。這對於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對儒家思想缺乏具體分析而加以全盤否定的傾向，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超越意義，並在儒家思想研究上起到了積極的導向作用。《孔子的智慧》於1938年出版後，受到了美國廣大讀者的歡迎。而且在長時期內，它一直是西方讀者瞭解孔子及其學說的入門之作。因而，僅此而言，就可以認為林語堂為促進西方讀者瞭解我國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8月8日，林語堂在巴黎動筆寫作《京華煙雲》。1939年8月8日，林語堂在美國寫完了全書。《京華煙雲》由紐約約翰·黛公司出版，並立即被美國的“每月讀書會”選中，成為12月特別推銷的書。《時代書刊》也發表書評說：“《京華煙雲》很可能是現代中國小說之經典之作”。《京華煙雲》在美國一版再版，於20世紀40年代便銷售了25萬部。因而，《京華煙雲》成為我國現代文學較早走向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京華煙雲》能夠產生世界性的影響，並不是吹捧出來的，它確實是林語堂的嘔心瀝血之作，並無愧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而

它的鮮明特點是，在於用小說藝術的形式，表現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中國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尤為謳歌了中國人民悲壯的抗日救國鬥爭。整部小說，可以稱作為充滿傳統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氣歌。它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林語堂在文學史上作為小說家的地位，並體現了他作為國學家的底蘊。

1939年5月9日，林語堂應邀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國際筆會第17屆大會。這次大會由美國歷史學家盧龍擔任主席，而林語堂則是在會上發表演講的三人之一。其他兩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國的托馬斯·曼，法國著名作家洛亞。林語堂演講的題目是《希特勒與魏忠賢》。魏忠賢是我國明朝的一個異常奸佞而無恥的太監，為歷來中國人民所唾罵的千古罪人，也是林語堂最痛恨的小人。當林語堂看到希特勒給歐洲人民造成巨大的災難時，便將他與魏忠賢加以類比。其用意在於痛斥希特勒的極端殘忍和卑鄙，並預言他的下場必將跟魏忠賢一樣可悲。林語堂說：“當今有德國人以希特勒喻耶穌，就像中國有一位儒者倡議擅政獨裁的魏忠賢與孔子應當有同樣的地位。惟有這麼歌功頌德，才能保住差使，而反對他的官吏全給殘殺了。但是魏忠賢雖是聲勢顯赫，卻免不了人民的腹誹，其情形與今日之德國如同一轍。魏忠賢後來迫得只好自殺。自殺乃是獨裁暴君的唯一出路”。這不僅表明了林語堂的反法西斯立場，而且說明了他善於以魏忠賢這一中國歷史上的小丑作為一面反面鏡子，照出希特勒必然的可恥下場。頗有意思的是，五年後，果然不出林語堂所料，希特勒真的走向自殺的末路。林語堂還應邀為書評家兼編輯菲地門所編的《我的信仰》一書，寫了一篇有關他的信仰的文章。這本書一共收有十九位名人的文章，如愛因斯坦、韋爾斯(美國作家)、賽珍珠、杜威(美國哲學家)、羅素(英國哲學家)、桑塔雅那(西班牙哲學家和詩人)、魏白(美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和胡適、林語堂等。這說明在編者心目中，林語堂是在西方有很大影響的中國學者之一。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林語堂表示討厭煩瑣哲學，但喜歡對生命、生活、社會、宇宙及造物有一貫而和諧的態度，並特別推崇道家哲學。他寫道：“我們惟有走廣義的神秘主義的一途，例如老子所倡導的，以廣義言之，神秘主義乃為尊重天地之間自然的秩序，一切聽其自然，而個人融化於這大自然的秩序中是也。道教中的‘道’即是此意。它涵義之廣足以包括近代與將來最前進的宇宙論。它既神秘而且切合實際。道家對於唯物論採取寬縱的態度。以道家的說法看來，唯物主義並不邪惡，只是有點呆氣而已。而對於仇恨與妒忌則

以狂笑冲散之，對於恣意豪華之輩道教教之以簡樸；對於度都市生活者則導之以大自然的優美。對於競爭與奮鬥則倡虛無之說柔克剛之理以救濟之。對於長生不老之妄想，則以物質不滅宇宙長存之理以開導之。對於過甚則敬之以無為寧靜。對於創造事業則以生活的藝術調和之。對於剛則以柔克之。對於近代的武力崇拜，如近代的法西斯國家，道教則謂汝並非世間惟一聰明的傢伙，汝往前直冲必一無所得，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物極則必反，拗違此原則者終必得惡果。至於道教努力和乎乃自培養和氣着手。我們真是處於超野蠻時代。野蠻行為加以機械化敢不是野蠻行為了麼？處於這個冷酷的時代惟有道家超然的憤世嫉俗主義是不冷酷的。然而這個世界終有一天自然而然的會變好的。目光放遠點，你就不傷心了”。這一番話表明，此時的林語堂對於道家哲學思想，比起以前的他，更掌握了其中的精髓。林語堂在這裏不僅宣揚了道家哲學，而且借道家哲學指斥法西斯的倒行逆施必將失敗。這年9月1日，歐洲戰爭終於爆發。出於對德國法西斯的憎恨，林語堂於11月1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了《真正的威脅不是炸彈，是概念》一文。他在文中表現了對法西斯戰爭的大蔑視，深信人類文化決不會被戰爭毀滅。他說：“戰鬥跟求生一樣，是人生本能，但二者相較，我相信求生的本能比戰鬥的本能為強，所以求生的本能絕不會喪失；求生的本能既不會喪失，那麼文化，或者說生活的藝術，當然不會毀滅了”。正當法西斯異常猖獗，不可一世之時，林語堂所表達的這樣樂觀而堅定的信念，是能起到激勵人們的作用的。

林語堂在美國，一直自覺致力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宣傳抗戰。至1942年和1943年，他又分別出版了《中國與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兩書。《中國與印度的智慧》一書，由藍登書屋出版。這本書介紹中國和印度的文化經典，諸如老子《道德經》、《莊子》、《中庸》、《論語》及《詩經》，等等。這是林語堂繼編寫《孔子的智慧》之後，向西方介紹儒家和道家作品的又一本重要的書。《啼笑皆非》，則由紐約約翰·黛公司出版。它是一本政論著作，曾風行一時，成為美國1943年最暢銷書之一。它不僅具有異常強烈的政論性，而且充滿着中國傳統哲學的色彩。該書的一個突出的內容，是林語堂憤激地批評美、英對華的錯誤態度。他表示，“在我國與日本作殊死戰時，誰打中國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樣”。因而，他一口氣訴說了它們的七大錯誤。一是中日戰爭爆發後，美國採取所謂的“中立”立場，但一直運送汽油

和廢鐵去東京，使日本人轟炸中國婦孺，而羅斯福卻宣稱他們的“政策成功”。二是英國政府無意用自己的軍隊去保衛緬甸，使援華物資無法通過滇緬公路運入中國。三是英國在印度和緬甸扣留根據租借法案要交給中國的物資。四是滇緬公路被封鎖之後，美國不肯供給中國適當的空中運輸工具。五是中國軍事代表團到華盛頓提供情報和協同擬具共同作戰計劃時，受到了冷遇。六是誣蔑中國為“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囤積供應物資”，不給中國軍事援助，使中國受到傷害和侮辱。七是美英蘇三國首腦在卡薩布蘭卡開會竟將作為盟國的中國排斥在外。林語堂之所以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和英國的對華錯誤態度，目的是為了“打破封鎖供應中國物資的華盛頓堅壁”，以便有利於中國的抗戰。同時，林語堂尖銳地批評了西方國家想由白種人統治世界的企圖。他指出，它們奉行“物質主義”，“強權政治”，“地緣政治”，正是為實現世界霸權服務的。“物質主義”在“控制着所有的戰後計劃”，“如果強權政治的概念一直不改變……我們的子孫必然還要流血”，而所謂地緣政治則是“征服世界及世界鬥爭的政治，有意的將政治建立在地理戰略觀念上”。可是，他斷言它們的企圖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亞洲的出現簡直就是帝國主義時代之末日”。此外，林語堂用儒、道哲學探討了世界和平問題。他有感於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禍害，認為“人民需要和平”，提出了一種“和平的哲學”。他說：“和平就是一個極現實的生活條件……我們必須有一種哲學使我們相信和平是積極的，而不僅是免除衝突和戰爭”。鑒於對和平的認識，林語堂認為中國的傳統哲學是有益於世界和平的哲學原素。諸如老子的知足和不爭哲理有益於各國之間不打仗，孔子強調的禮樂治國有助於“大順”的世界和平，孟子的人類天性善良論有益於發揚人類的共同尊嚴和平等，等等。顯然，在他看來，中國的傳統哲學中有不少對人類和平大有益的哲理，有必要加以繼承和弘揚。

1943年秋，林語堂回國。1944年1月14日，他在長沙中山堂作了以《論月亮與臭蟲》為題的講演，他說：“各國文化有其利弊優劣，外國月亮也要欣賞，外國臭蟲也要防範。對本國外國文化都具真切的認識，批評的眼光。東西的優劣，應以大公無私的學者眼光見識去批評，這才可叫做東西文化之溝通，而且溝通得起來”。“要真正達到溝通東西文化境地，第一便須有自信心，立穩腳跟。要自信心，必有膽識，然後方能方寸不亂，去批評各方的優劣。東方月亮也

賞，西方月亮也賞。東方臭蟲要拍滅，西方臭蟲也要拍滅。若自信心不立，先自慌張，認為東方本無文化，方寸已亂，見了西洋文化，五體投地跪拜，怎能夠說得上批評”。“盲目拜外，固然不是，一味復古，也無是處。在這一點，更需要對於儒道釋有真知灼見的常識。儒家的中心思想，必須找到，始可以談到中國固有的文化。尤其要與西方比較一下，權其輕重，知其利弊，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得一哲學條理，然後可謂學者的批評態度，然後可合大國之風。我想大學修身齊家治平的話，顯而易見，其理易尋，懂得的人，十有八九。但是，中庸一書，真懂中庸至德，而能以科學原理說出來的，也許國中沒有幾人。怎麼叫做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及盡人性盡物性之關係，都有玄通的哲理在焉。再如莊子齊物之論，列子商丘開之喻，都可與現代科學相對證，使理益彰而意益明。這也是治學的人應用一番苦心，發明新知，使古今中外互相印證，這樣做法，然後可以融會貫通，自由自在，書為我用，我不為書用，收古今中外為我注腳”。“總之，要講東西文化的溝通，大家必須肯用頭腦，用思、學並用的功夫，然後能貫穿中外。由思而疑，由疑而悟，自然到達一種融會貫通之樂，並由融會貫通，而對吾國舊有文化起立信心。有自信心，而後中國人敢說中國話，已往文化思想得以斷續不墮”。所有這些看法，無疑都是正確的。這表明林語堂對東西文化確實作長時期的比較研究，才有這樣真切的見解。

三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林語堂沒有回到祖國，繼續留在美國致力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林語堂這時着手寫《蘇東坡傳》，歷時三年完成，於1947年由約翰·黛公司出版。

1947年春，林語堂前往巴黎出任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美術與文學組主任。他上班後，忙得疲倦至極。不久便提出辭職，並從巴黎搬到法國南部的坎城，繼續以寫作為業。在坎城，林語堂編寫了《老子的智慧》等書。《老子的智慧》於1948年出版。該書是林語堂向西方介紹道家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全書除了《序論》、《序文》外，設有七章，即《道之德》、《道之訓》、《道之體》、《力量之源》、《生活的準則》、《政治論》和《箴言》。每章的具體內容，則是《道德經》的一部分和《莊子》的有關文字，並附有譯文。林語堂認為，老子《道德經》雖然在文學

史上的地位不如《莊子》，但是它蓄藏着“更為精煉的俏皮智慧之精髓”。它是世界文壇上最光輝燦爛的自保哲學。它不只是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極抵抗，而且教人守愚之為智，處弱以為強。它所說的“不敢為天下先”，就是不受人注目，不受人攻擊，因而便能立於不敗之地。對於老子哲學最高範疇的“道”，他認為是宇宙的神智，萬物的根源，是賦予生命的原理；公正無私，含蓄無形，看不見摸不着。它創造了萬物，改變了萬物；它是不朽的本體。而對老子為甚麼總是強調以柔克剛，他則認為“答案是：宇宙周而復始的學說——所謂生命，乃是一種不斷地變遷，交互興旺和腐敗的現象，當一個人的生命力達到頂峰時，也正像着要開始走下坡路了，猶如潮水的消長，潮水退盡，接着漲潮”。類似這樣一些問題的闡釋，都說明了老子哲學具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林語堂認為，莊子是老子的弟子，是最偉大的道學家代表人物，而且“老、莊思想的基礎和性質是相同的”，“他們的觀點幾近完全一致”。如果有甚麼不同的話，只是表達方法不同而已。如：老子以箴言表達，莊子以散文描述；老子憑直覺感受，莊子靠聰穎領悟；老子微笑待人，莊子狂笑處世；老子教人，莊子嘲人；老子說給心聽，莊子直指心靈。因而，他在這書中除了收入老子《道德經》全部內容外，還選擇了《莊子》的許多篇甚，以便讀者更好地把握道家思想。可以說許多西方人都是從林語堂的有關著作中去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因而，林語堂確實是努力使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學者。

林語堂自旅美以來，一直兢兢業業地用英文寫作並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介紹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著作，促進了西方讀者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瞭解，為溝通中西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為了表彰他的努力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先後有三所美國高等學府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1940年，紐約艾邁大學率先授予林語堂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該校的校長讚揚他說：“林語堂——哲學家、作家、才子——是愛國者，也是世界公民，您以深具藝術技巧的筆鋒向英語世界闡釋偉大中華民族的精神，獲致前人未能取得的效果。您的英文極其美妙，使以英文為母語的人既羨慕欽佩又深自慚愧”。1942年，新澤西州若特洛斯大學授給他同樣的榮譽。1946年，林語堂又獲得威斯康辛貝路艾特大學授予的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該校校長讚揚他說：“林博士，東方學者，世界文士，您具有國際思想，為中華民族揚眉吐氣，您的卓越不凡的寫作已使您在世界上成為非官方的中國大使”。

從這些讚詞來看，美國學界是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林語堂的才華、學問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所取得的成就的。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認為林語堂為中國贏得了莫大的榮譽。這就表明，他是博得了美國學界衷心尊重的中國學者。筆者以為，林語堂的英文作品，不但能為國外讀者親灸大師名著的原汁原味提供便利，而且能為當前國人對外弘揚中國文化、重新塑造中國形象的努力展示一個切題的、成功的範例。蓋棺論定，林氏宣傳中國文化的貢獻，要遠遠高於魯迅和胡適等人。

1959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了所謂“康隆報告”，製造了所謂“兩個中國”的謬論。林語堂出於強烈民族感情，堅決反對美國政府這一企圖永遠分裂中國的圖謀。他曾在紐約自己的家裏，異常憤激地對前來看望他的陳紀澄說：“美國的兩個中國觀念是錯誤的，不只中華民國反對，就是毛澤東也不贊成，他們不瞭解東方，更不瞭解中國人”。⁸據陳紀澄回憶，林語堂當時說這番話時的情形是這樣的：“他說這段話時，是站着說的，渾身用力，雙拳並舉，兩眼要迸出火星似的。真沒想到林氏這樣快人快語。可惜那一剎那間沒留下鏡頭，否則必是一副動人的身影。雖然如此，我至今還記得這一幕景象”。此後不久，林語堂還替梁和鈞起草的《康隆報告的分析：亞洲人所見的謬妄和矛盾》作修正核定，並領銜簽名，公開表明他堅決反對美國政府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場。

1968年6月18-20日，國際大學校長協會在韓國漢城舉行第二屆大會，出席的有五十多個國家的大學校長暨學術界人士二百多人。林語堂等八人作為台灣方面的代表，應邀參加了這次大會。他以《趨向於全人類的共同遺產》為題，發表了四十多分鐘的講演。他這次講演最主要的論點是分析東西文化的差異及兩者融和的途徑：“一、中國人的思考以直接的洞察力及對實體的全面反應為優先，西方人以分析的邏輯思考為優先。西方人多執着於抽象方法證實的，不能算是真知識。直覺或直覺的觀察力在西洋邏輯系統中是沒有地位的。西洋邏輯常將事物逐段分析研究，因而有時只見片斷現象而忽視了整體。中國人的直覺觀察力是一種明敏的瞭解方式，大部分憑藉以往的經驗，亦可稱為經驗主義，對事物易作全盤的、整體的瞭解和估量。西方哲學特別着重探討知識，尤其是自笛卡兒(1596-1650)之後，哲學方法普遍偏向於科學實證，在這種趨勢之中，往往有時只見樹木而未見森林，甚至只見樹葉而未見樹木。由於忽視了全景的觀察，對於精神方面的許多真理，例如常常談到的信仰、希望、

博愛等，又如愛國情操、精神不朽、良辰美景等，便很難得到圓滿的解釋。二、中國人以感覺作為現實體不可分的一部分；對於事物的看法，不像西洋人專說理由，而多兼顧感覺，有時且將感覺置於理由之上。西方哲學家常假定事物是靜止不動的，並將之分割為若干部分，以便於實驗或求證。中國哲學認為事物是變動的，經常都在或快或慢的變化中，而初次感覺或自然感受所得的印象至為重要。這種感覺狀態，很難像物質一樣將它分解開來研究，只可作些比喻。例如兩軍作戰，西方人的觀點較重視兵力、裝備、補給等因素，中國人除了這些之外，還重視軍隊的士氣。三、中國哲學的‘道’相當於西洋哲學的‘真理’，但含義比‘真理’廣闊些，因西洋的‘真理’，僅是指到達正當生活的途徑；而中國所謂‘道’，平易近人，是指人人應該走，且是人人可能走的途徑，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孔子謂‘道’不可須臾離開了人生，可以離開人生的，便不是道；但西方所謂‘真理’，縱使離開了人生，依然稱為‘真理’”。

1975年9月，國際筆會第40屆大會在維也納舉行。在這次大會上，林語堂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成為亞洲學人膺此榮譽職位的第三人(另外兩人是印度的光詩南，日本的川端康成)。而且，他的《京華煙雲》也被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作品。因而，他作為國際著名學者和作家所獲得的榮譽，達到了頂峰。

1976年3月26日，林語堂逝世。《中國時報》發表社論說：“林氏可能是近百年來受西方文化薰陶極深而對國際宣揚中國傳統文化貢獻最大的一位作家與學人。其《吾國與吾民》及《生活的藝術》以各種文字的版本風行於世，若干淺識的西方人知有林語堂而後知有中國，知有中國而後知有中國的燦爛文化。尤為可貴者，其一生沉潛於英語英文，而絕不成為‘西化’的俘虜，其重返於中國文化的知識勇氣及其接物處世的雍容謙和，皆不失為一典型的中國學者”。

美國《紐約時報》以第一版刊出林語堂逝世的消息，以三欄的篇幅刊登林語堂的半身照片，並詳細介紹他一生的經歷及其對中西文化學術界的卓越貢獻，讚揚他“向西方人解釋他的同胞和國家的風俗、嚮往、恐懼和思想的成就，沒有人能比得上”。

華盛頓大學教授吳納孫評價林語堂說：“林語堂是一位偉大的語言學家、優良的學者、富於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作家。不寧惟是，他是一位通人，擇善固執，終於成為蓋世的天才。要說那一項造詣是他最大的成就，就已經錯了。他向西方和中國人證明，一個人可以超越專家這個稱謂的局限而成為一個通才”。

美國前總統老布甚 1989 年 2 月 10 日對國會兩院
聯席會議講演時，也稱讚林語堂的著作說：“林語堂
講的是數十年前中國的情形，但他的話今天對我們每
一個美國人都仍受用”。

註釋：

- ¹ 劉炎生：《林語堂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 年，序言。
- ² 林語堂：《林語堂自傳》，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³ 林語堂、宋碧雲：《八十自敘》，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9 年。
- ⁴ 林語堂：《煙屑》，載於《宇宙風》，第 6 期，1935 年。
- ⁵ 林語堂：《古書有毒辯》，載於《宇宙風》，第 18 期，1936 年。
- ⁶ 林語堂：《論足赤之美》，載於《無所不談合集》，台北：開明書店，1985 年。
- ⁷ 林語堂：《關於〈吾國與吾民〉及〈生活的藝術〉之寫作》，載於《語堂文集》下，台北：開明書店，1978 年。
- ⁸ 陳紀澄：《我所知道的林語堂先生》，載於《傳記文學》，第 31 卷，第 6 期，1977 年。